

關愛和／著

中國近代文學論集

中華書局

近百年間社會制度幾度更迭，政治文化劇烈革新，意識形態紛爭多變，使得二十世紀數代學者面臨不同的歷史觀、文學觀和文學史觀，對同一問題，評價一八四〇—一九四九年這個歷史階段的事實時，顯示出極大的認識差異。這種認識差異的存在，使二十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的研究，呈現出不同的階段性特徵。隨着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入，實事求是的學風逐漸恢復，諸多妨礙正確認識近代文學發展歷史的禁忌不斷打破，研究趨于國際化，有意識地把近代文學作為一種學科予以全面建設，是八十年代以後研究者最共識，因而研究的系統性、組織性、科學性大大加強，研究者的價值觀念、文學史觀、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也在更新，論著質量不斷提高，紛紛問世，近代文學研究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

關愛和 著

中國近代文學論集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近代文學論集/關愛和著. - 北京:中華書局,
2006

ISBN 7 - 101 - 05126 - X

I . 中… II . 關… III . 近代文學 - 文學史 - 研究
- 中國 IV . I209.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41113 號

責任編輯:王傳龍

中國近代文學論集

關愛和 著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未來科學技術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印刷廠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1/32 · 18 1/4 印張 · 2 插頁 · 420 千字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2000 冊 定價:38.00 元

ISBN 7 - 101 - 05126 - X/I · 702

凝思於古典與現代之間

——序關愛和《中國近代文學論集》

劉增杰

《中國近代文學論集》是關愛和先生繼《從古典走向現代》、《悲壯的沉落》、《古典主義的終結——桐城派與「五四」新文學》等專著問世之后的又一部力作。

在我看來，《論集》對如下兩個問題的研究最具學術價值。

一是關於中國文學從古典到現代轉型問題的研究。自鴉片戰爭始，帝國主義接連對中國發動了一次次蓄謀已久的侵略戰爭。侵略者攻城掠地的暴行，給中國人民制造了空前的民族災難，粗暴地蹂躪着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中國人民抵抗侵略、探求民族新生之路的鬥爭前仆後繼。正是在這種血與火的歷史變革與演進中，中國文學開始了從古典走向現代的艱難蛻變。對於豐富而又複雜的轉型期文學研究，其意義不僅僅在於文學自身。處於轉型期的中國近代文學，它甚至是一部民

族心理變革史。可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於這一時期文學的研究却没有給予應有的關注。如一位近代文學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這大半個世紀，正是中國歷史舞臺上侵略與抵抗、起義與鎮壓、求變與循舊各種衝突鬧得沸反盈天，因而歷來爲史學家們矚目的時期，然而，却又曾經是被不少文學史家漠然以視之、淡然以述之，甚至鄙然以斥之的文學時期。關於這一時期的文學思潮的研究，更形寥落蕭瑟。」（王綱：《悲壯的沉落》，一九九三年《中國文學年鑒》第四一八頁）在青年學者中，更以近代文學藝術成就不高、語言艱澀等由對此領域望而却步。而在二十多年前，關愛和却果斷地做出了自己的學術選擇。

一九八一年，近代文學史家任訪秋先生，率先打破近代文學、現代文學的人爲分割，開始在國內招收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生。關愛和立即報名參考，并獲錄取。由此開始，他凝思於古典與現代之間，考稽史料，研讀作品，對於轉型期文學提出了許多具有學術原創性的見解。他指出，作爲歷史「中介物」——過渡轉折期的中國近代文學，它既是中國傳統古典文學的承續與終結，同時又是中國文學走向現代的先聲。他的研究論文中，經常出現的關鍵詞語是「蛻變期」、「從古典走向現代」、「過渡轉型期」、「從古典到現代的轉型歷程」、「文學變動說略」、「情感流向」、「心路歷程」、「新舊之爭」等等。這些話語清晰地折射出了作者的研究指向：轉折年代的文學轉型研究是他研究的重心之所在。

這一學術選擇的意義是不言自明的。轉折年代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文學最激烈變動的年

代。歷史演進的由量變到質變，它的變動形態的豐富性，諸如傳統文學思想的衰微，新文學思潮的萌動，新舊社會力量的較量，新的社會力量在較量中的挫折，以及新的力量的重新醞釀，聚集，旋又開始新的較量，一切都有聲有色，波濤迭起，直至爲新的力量的勝利鋪平了道路，準備好了充分的條件。轉折年代也是文學歷史發展的矛盾性、復雜性、多重性展示最爲充分的時刻。這些，都爲研究者提供了巨大的研究空間，用武之地。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實際上是關愛和對轉折年代文學研究的起點。這位眉清目秀的青年人，平時略嫌腴腆文靜，不苟言談，外斂內秀，在當時衆多研究生中并不起眼。但當三年即將過去，他怯生生地將自己研究桐城派的畢業論文恭交導師任訪秋先生和我時，我們的眼睛都豁然一亮。論文宏論紛呈，疾徐有致的敘述節奏和清新明快的語言竟使我們愛不釋手。一九八四年十月六日任訪秋先生日記，記載了先生閱讀論文后的欣喜之情：「下午，看關愛和的論文，條理明晰，有分析有比較，評述恰當，語中肯綮，還是有質量的。」（《任訪秋先生紀念集》第三七六頁）我從這篇論文的閱讀中，捕捉到的則是這位年青人的朝氣，自信，胸有成竹，宏闊的學術眼光和細膩的藝術感覺。我記得自己也興奮地爲論文寫了一段贊賞性的評語，具體語句已經模糊，只記得有后生可畏，來日方長，前程不可限量數語。後來和任訪秋先生見面，當又說到這篇論文，我們又幾乎同時脫口而出：「汝子可教也！」關愛和沒有辜負導師的期望。他學術研究的一個明顯特點是厚積薄發。三萬字的桐城派碩士畢業論文，後來當涉筆桐城派時，他竟一發而不可收，呈現給了讀者一部三十五萬字的桐城

派研究新著：《古典主義的終結——桐城派與「五四」新文學》。關愛和的學術實踐告訴人們，畢業論文的學術選擇的極端重要性。對於一個青年學子來說，有時它竟可能是終生的學術指向，為自己的未來鋪設的第一塊學術基石。

學術選擇直接體現着選擇者的眼光和智慧，但選擇本身并不能保證選擇者的成功。更為重要的是，選擇者還必須對研究對象用心去感受，用深邃而懷疑的目光去審視，特別是以堅實的史料為基礎進行學理辨析。

熟而生疑。研讀史料使關愛和發現，在一段時間內，由於研究者對唯物史觀運用得不够純熟，根據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機械劃分，「在文學研究活動中，原本存在的以五四文學為分界的新舊文學的對立被擴大化；五四文學與維新文學聯繫被粗暴割斷」，造成了近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研究的人為斷裂。循此思路前進，關愛和在近代文學與現代文學之間，看到了更多內在的、深層的精神聯繫，發出了具有個性化的學術新聲。談到梁啟超對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影響時，關愛和作了如下的描述：「梁啟超有關文學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其在文學發展史上的意義，並沒有被世紀初的研究者所充分意識到，但梁氏文學革命的現實影響，却是同時代人所深切感受到的。」（《中國近代文學論集》第五一九頁）這樣的辨析，雖只是點到而止，但却熔鑄着他多年凝思冥想的真切實感，因而自成一家之言。關愛和對桐城派與新文學運動關係的分析尤具真知灼見。他說：「新文學運動固然由於桐城派的『反動』所起，而新文學運動的倡導者所受桐城派中人物潛移默化影響的事實也不可

抹煞。新文學不是橫空出世的舶來之物，它與民族文化、民族文學便有着割舍不斷的聯繫。這種聯繫可以被忽視，但決不會不存在。」（《中國近代文學論集》第四三四頁），這段平實的話語透露出的，是深邃的思想力。「潛移默化」四個字，準確、真實地道出了新文學倡導者和桐城派的內在聯繫。這種聯繫甚至是與生俱來、深入骨髓的永遠無法割舍的愛與恨。時過景遷，當當事者帶有強烈功利性的過激情緒淡化之後，這段話的真理性就益加彰顯。

在總結綿延二百餘年的桐城派終歸於沉寂的原因時，作者除指出了新文學運動的攻伐外，還着重分析了桐城派自身藝術創造力的衰竭，其所固守的文化價值及道統、文統觀念的不合時宜，其行文拘謹、禁忌繁多的文言文體形式與日益豐富繁雜的時代內容不可協調的矛盾，以及科舉制度的廢除、封建王朝的覆滅等桐城派賴以生存的社會條件的變化，等等，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桐城派走向消亡的條件。他還進一步指出，桐城派古文的消亡與新體散文的涌現，「成為中國文學從古典走向現代的一道醒目的風景和一次充滿思想衝突與文化意蘊的歷史性轉換。」（《中國近代文學論集》第四三九頁）言詞之間，對桐城派的消亡表現出了應有的理解，對文學的歷史性轉換則充滿了憧憬。

對文學轉型問題的深入觀察與研究，常使關愛和能一語中的。如由桐城派到湘鄉派，其風格變化特點很難用一兩句話說明白，他則僅用「風格由氣清體潔到崎嶇雄俊醇厚老確之境」來概括，要言不煩，畫龍點睛。

第二是作家心路歷程研究。如果說作者的研究一方面是用理論脈絡挑明文學轉換的歷史必然

性，他那含而不露的思想鋒芒，常常深藏於隱而不彰的理性內核中；那麼，強烈的藝術感悟力又使他能夠通過作家心靈的微波蕩漾感知時代精神的流向。關愛和從對近代作家心路的考察中，明顯地感受到了「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在沐浴歐風美雨的同時，也在不斷地在民族本源文化中尋求精神支撐。」（《中國近代文學論集》第二十二頁）從全局着眼，他提煉出近代作家三種明顯差異的心理價值取向。《論集》指出：「他們或以板結的思維心理定勢看待日益蓬勃發展的西學東漸浪潮，死死固守以夏變夷的僵死封閉的文化觀念；或在承認中國技藝落後的同時，却充分肯定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和禮樂教化的巨大優越性，在文化選擇中恪守中體西用的原則；或不僅承認中國技藝不如人、政治制度不如人、文化與文學皆不如人，試圖借助西方異質文化的衝擊力量，蕩滌傳統文化的污泥濁水，建立適應民族生存與發展的新型文化。毫無疑問，第三種文化心理價值取向對於一潭死水般的中國的進步更具有建設性意義，近代中國所發生的文化變更與文學革新，正是在這種心態支配下醞釀發動的。」這一段描述，實際是近代作家心路歷程的濃縮與概括。

關愛和辯證地認為，五四文學精神既有着民族本源文化精神的支撐，又非晚明以來人文思潮的簡單復寫。指出，思想與文學的演進，取決於社會需求與創造者的主體意志，而文學的創造，既包含着創造者個體的情感與生命體驗，又融合着豐富的社會與時代內涵。后者是文學的生命之源而前者是文學的精靈所在。本此理念，關著對作家心路歷程的抒寫，成為本書的一個耀眼的亮點。他以點帶面，對多位近代作家的思想進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劍氣簫心龔詩魂》、《論老殘》，新見迭

出，出語驚人，其對人物維妙心理剖析之貼切，讓人擊節贊嘆。作家心路歷程研究實際上又是對轉型問題研究的加深與豐富。兩個問題互為補充，相得益彰。起草以上諸文時關氏還是一位青年學者，他的藏而不露的才華，盡在這洋洋灑灑的文字中間。

古典與現代之間，是一座取之不盡的學術富礦，一片看不到邊際的學術莽原，一個充滿着誘惑力的學術磁力場。在這段歷史的深處，藏有轉型期文學永恒魅力的全部秘笈。誠如作者在《桐城派與「五四」新文學》一書所標示：古典主義有終結，可對於古典與現代之間學術的凝思却永遠無法終結。作者在一篇《後記》中告訴我們，他曾試圖將晚清舊派文學陣營中的桐城派、選派、宋詩派、常州詞派的審美選擇和文化命運，作一總括性的描述，可「當涉筆至桐城派時，竟絮絮不休，共達三十餘萬字。於是只好將這三十餘萬字的稿子先行交出版社，有關宋詩派、常州詞派、選派的文字，只有留到來日了」。我們饒有興味地期待着，作者那些「留到來日」的思考，能够早日化做給讀者以新的啓迪的華章。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於蘋果園新區寓所

目 錄

凝思於古典與現代之間	一
晚明至「五四」文學變動說略	一
《南山集》案與清代士人的心路歷程	二六
經學同文學的分野與衝突	四二
義法說：桐城派古文藝術論的起點和基石	六四
姚鼐的古文藝術理論及其對桐城派形成的貢獻	九〇
嘉道之際的文學精神與創作主題	一一〇
龔自珍文學思想散論	一三七
劍氣簫心龔詩魂	一四七

蔣湘南文學略論	一六五
鴉片戰爭前夕的文學論爭	一七五
鴉片戰爭詩潮的情感流向	一九六
自立不俗與學問至上：清代宋詩派的兩難選擇	二〇八
梁啓超與文學界革命	二二〇
別創詩界的黃遵憲	二六〇
譚嗣同文學略論	二八八
晚清戲曲改良運動述略	三〇〇
守望藝術的壁壘	三一〇
稗官爭說俠與妓	三三五
論老殘	三六九
清末常州詞派概說	三八七
二十世紀初文學變革中的新舊之爭	四一三

「五四」之後新文學家對桐城派的再認識	四三五
--------------------	-----

柳亞子簡論	四四八
-------	-----

蘇曼殊譯作述評	四七四
---------	-----

辛亥革命烈士寧調元詩文簡論	四八七
---------------	-----

附 錄：

《中國近代文學史》緒論	四九九
-------------	-----

二十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研究述評	五二九
----------------	-----

探尋中國文學從古典到現代的轉型歷程	五四四
-------------------	-----

晚明至「五四」文學變動說略

在晚明至「五四」之間三個多世紀波瀾壯闊的歷史演進中，蘊含着許多耐人尋味的理論課題。其中，士階層個體發展理想與群體生存意識的盈虛消長，浪漫主義激情與實踐理性思潮的此起彼伏，造就了不同的士林風尚，而不同的士林風尚對與之相應的時代文學精神的化育陶鑄，在三年間，構成了數個極富有對比性的文化過程。本文試圖從士林風尚的轉換入手，簡略描述晚明至「五四」時期中國文學所經歷的變動，以及這種變動所給予我們的啓示。

一、晚明浪漫激情與尊己向俗的文學旨趣

晚明是我國舊有的政治、文化結構發生重要變動的歷史時期。隨着十六世紀前後社會生產力的逐步提高，社會分工的不斷發展，沿海新興工業城鎮和地域性商業資本集團的形成，一個新的社會共同體商人——市民階層在悄悄崛起。迅速擴大的商人——市民階層，有着自己的社會、政治利益，顯示出獨特的價值取向和道德觀念。他們不滿足於現存的社會等級秩序，充滿着提高自身社會地

位的願望。他們鄙薄腐儒「口不言利」的虛偽，肯定「私利」的合理性，而不掩飾對各種人生欲望的渴望，並把它看作是成功的動力。他們熱情地呼喚並創造着符合商人——市民階層利益和審美趣味的文化與文學。

商人——市民階層的存在及其意志，構成了社會、文化結構變動的基礎，而陽明後學中的泰州學派，則充任了晚明文化運動的中堅和推動者。泰州學派的創始人王艮，其後學顏鈞、何心隱、羅汝芳、李贄，將陽明心學中的某些理論命題極致化、世俗化、平民化，以「愚夫愚婦皆知所以爲學」作爲傳道宗旨，以處於社會中下層的一般民衆作爲立教對象，其學術思想中，充滿着對自然人性的肯定，對平等觀念的推演，對自我精神的擴張，充滿着與商人——市民階層思想傾向、價值觀念暗合，與舊有社會規範、道德倫常抵牾的精神因子。

人的自然屬性如情感、欲望是與生俱來的。食、色、聲、味等自然屬性的滿足甚至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必要條件。自然的人生生活在群體社會之中，又被賦予一定的社會屬性。不可缺少的生活秩序、倫理道德等社會規範的建立，構成了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如何調整與緩和二者的對立緊張，使之維持在一種和諧狀態，是歷代思想家不可回避的課題。從孔子原始儒學的「克己復禮」。到宋明理學「天理」世界的建立，無不要求人們在克制個人情感、欲望的前提下，達到思想的和諧與社會的穩定。陽明心學體系建立在程朱理學之後，它試圖把理學外在的「天理」內化爲「良知」，把社會規範的落實寄托在「心」的純化之上，以避免「天理」、「人欲」的外在對立，使人們對社會

規範的恪守成爲心理上的自覺要求。「良知」是一個理性與情感的混合體，左派王學正是從這裡出發，走向了有違心學初衷的變異。他們不斷擴大情感因素在「良知」中的比重，爲久久壓抑的自然人性打開了掙扎而出的通道。陽明後學由王畿到王良，其「任心之自然」即可致良知之說，其「百姓日用是道」之說，已露出變化的端倪。至泰州學派，則將自然人性論發揮到一種極致。他們首先承認食色聲味、穿衣吃飯，講求私利是人的自然本性，「人之好財貪色，皆自性也。」（一）「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二）「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三）進而強調順應自然人性即是得道，即是天理：「只是率行而行，純任自然，便謂之道。」（四）「天初生我，只是赤子。赤子之心，渾然天理。」（五）

肯定自然人性，講求率性而行，憑借「良知」，爭得與聖人、權貴同樣的政治參與、知書論學的權利，泰州學派的立說同時蘊含着強烈的社會平等的要求。他們認爲：「人不論老幼、貴賤、賢愚，都有受教育的權利，業不論士農工商，致一之道與侯王同等，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聖人不曾高，衆人不曾低，不必時時取足仰仗於聖人。」

承認自然人性存在的合理性，承認人類天生平等，承認每個人在政治、思想、學術、教育各個方面都具有相等的社會權利，抹去涂在封建等級制度與思想權威之上的神聖光暈，追求人性的自在發展、人格的獨立平等，遂使泰州學派的學說具有了人文主義和思想革命的光彩，由恢復天理的網絡走向人性意識的蘇醒，以社會平等的口號向封建等級制度、思想權威發出挑戰，這是晚明人文主義

思潮產生震聾發聵作用的重要原因。

不惟如此，泰州學派還從陸王心學中汲取了「自作主宰」、「自立自重」及「知行合一」的思想精髓，在其以「百姓日用之道」作為立學宗旨，以沿街串鄉方式講學傳教的同時，鍛鑄了以貴我尊己，無待乎外的主觀戰鬥精神與狂熱奮鬥、矢志不悔的生命意志為兩大特征的學派集體意識。這種學派集體意識支配下的泰州學派，在治學與參與現實生活的實踐活動中，表現出漠視神靈、漠視權威、漠視傳統、漠視現有行為規範，注重心靈、注重自我、注重創造進取、注重率性任情的思想風範。李贄自言其治學之道云：「我以自私自利之心，為自私自利之學，直取自己快當，不顧他人非刺。」〔六〕其「直取自己快當」一語，即是泰州學派貴我尊己學術精神的寫照。至於王艮背離純然儒者以書院為講壇的傳道形式，自制蒲車，沿途聚講，何心隱謂「人倫有五，公舍其四，而獨置身於師友聖賢之間」〔七〕，羅汝芳為營救顏鈞、何心隱而不惜丟官破產，李贄出入佛老，於芝佛堂中供孔子像，晚年剃發留鬚，吃酒肉依舊，講學公然招收女弟子，不諱異端惡名，謂「此間無見知人多以異端目我，故我遂為異端，以成彼豎子之名」〔八〕，都顯示出獨立不倚，恃才傲物，於狂放中見其真性的立世精神。黃宗羲以批評的口吻論泰州學派道：「泰州之後，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傳至顏鈞、何心隱一派，遂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有來者。」〔九〕泰州學派所展示的士人性格與人生境界，使世人耳目一新。

以泰州學派為中堅的晚明文化運動，打出了具有反封建啓蒙意味的人文主義旗幟。自然人性